

縱論美匪關係 (上)

壹 美匪關係新發展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五日至二月十九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季辛吉第五次訪問北平，與毛匪澤東、周匪恩來會談，二十二日美匪同時

發表「聯合公報」，宣佈各在對方的首都設置「聯絡辦事處」，擴大貿易，以及科學、文化和其他方面交流。此為繼美國尼克森總統一九七二年二月訪問北平，與周匪恩來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之後，又一震撼國際的一件大事。

美匪宣佈互設「聯絡辦事處」，以及季辛吉於「公報」發表後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與夫美國務院中國科科長莫柳泉於二月二日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有關「台灣前途」座談會上的發言，美國務院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葛林於二月廿日論述美匪關係的進展，美國務院發言人布瑞於三月二日發表有關共匪與中華民國舉行直接談判的建議，這一連串特殊情況的出現，正反映美匪勾搭業已邁入另一階段，殊值吾人注

意。

一、美匪的「聯合公報」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美匪雙方同時就季辛吉訪匪發表一篇五百多字的「聯合公報」，其全文照錄如下：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五日到二月十九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吉博士訪問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陪同他的赫伯特·克萊因、艾爾弗雷德·詹金斯、理查德·肯尼迪、約翰·霍爾德里奇、溫斯頓·洛德、喬納森·豪、理查德·索洛蒙和彼得·羅德曼。毛澤東『主席』接見了季辛吉博士。季辛吉博士和他一行中的成員同周恩來『總理』，外交『部長』姬鵬飛，外交『副部長』喬冠華和其他『中國』官員進行了一過程並改善聯絡，經商定每一方將在不久的將來在對方的首都建立一個聯絡處。其細節將通過現有渠道擬就。雙方一致認為，美

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關係的正常化將對和緩亞洲和世界緊張局勢作出貢獻。季辛吉博士及其一行給予他們的熱情款待表示所有這些會談都是在無拘束的氣氛中進行的，是認真、坦率和建設性的。雙方回顧了尼理』章文晉就技術問題舉行了平行的會談。所有這些會談都是在無拘束的氣氛中進行的，是認真、坦率和建設性的。雙方回顧了尼

丁匡華

克森總統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年以來兩國關係的發展以及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

他們重申了一九七二年二月在上海發表的聯合公報的各項原則和他們為實現關係正常化所共同承擔的義務。他們認為，這段時期內取得的進展是對兩國人民有益的。雙方一致認為現在是加速關係正常化的適宜時機。爲此目的，他們約定要擴大他們在各方面的接觸。他們商定了一項擴大貿易以及科學、文化和其他方面交流的具體計劃。爲了便利這一過程並改善聯絡，經商定每一方將在不久的將來在對方的首都建立一個聯絡處。其細節將通過現有渠道擬就。雙方一致認為，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關係的正常化將對和緩亞洲和世界緊張局勢作出貢獻。季辛吉博士及其一行給予他們的熱情款待表示所有這些會談都是在無拘束的氣氛中進行的，是認真、坦率和建設性的。雙方回顧了尼理』章文晉就技術問題舉行了平行的會談。所有這些會談都是在無拘束的氣氛中進行的，是認真、坦率和建設性的。雙方回顧了尼

辛吉答稱：「我們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之間歧見和平解決。我們此時無意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我們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達成一項令人滿意的安排，即我們在北平設立『聯絡辦事處』，他們在華府設立『聯絡辦事處』，我們相信，在可預見的將來，此種安排將適應當前需要。」這段話出自計謀多端的白宮外交策士季辛吉之口，實得值得重視。

三、布瑞對「聯絡辦事處」的解釋

在此同時，呼應季辛吉言論的，是美國務院發言人布瑞在當天（二月廿二日）例行記者招待會上發表有關美匪互設「聯絡辦事處」的補充說明。布瑞稱：美國過去曾在與其無外交關係的國家內設立官方代表機構，執行某些特殊及一般外交任務。例如，美國原與約旦無外交關係，但曾在巴勒斯坦設立「聯絡處」，直接與約旦當局互通款曲，以後又在蘇丹設立同樣性質的官方代表機構，故此次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協議互設「聯絡處」，對美國來說，並非首創先例。當然，我們不能說「聯絡辦事處」就是「大使館」，未來的「聯絡辦事處首席」就是「大使」。因雙方畢竟尚未走向此一途徑，但名稱之改變，祇需一紙聲明便可做到。目前，美國對改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重實質，而不重形式，故名稱已成為次要問題。

三月二日，布瑞又對被詢美國對共匪最近所提與中華民國政府舉行直接談判建議時表示：「美國的立場已明見於去（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發表

的上海公報，這是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的問題，我們樂見此項問題終能獲致和平解決；但我們並未預期可扮演任何積極的角色」。布瑞同時並強調：「我們對中華民國具有防衛承諾，此項條約未定有屆滿的期限」。布瑞此項言論，自然是代表尼克森政府發言，也可以說，這是當前美國對「中國問題」的政策。依華府的觀點，美匪關係為國際關係之一種，然而中國只有一個，而中華民國政府乃依中華民國憲法選舉產生的唯一合法政府，此政府自一九四七年我國行憲以來一直獲有美國的正式承認。美國為尋求對毛匪關係正常化之必將損失中華民國權益，且事實上涉有干預中國內政之嫌，却又難作絕對的辯解。是以共匪在與美國達成互設「聯絡辦事處」協議之後，立時作出姿態，有所謂與我政府直接談判建議之提出，實乃懷有極為兇險的陰謀。此陰謀為何，

一言以蔽之，即佯為投合美國政府「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心理和願望，從而分化我中美盟邦的團結，陷使美國走上助桀為虐的道路，終而助有於依其匪詭計而求取所謂臺灣問題的解決。

四、葛林闡述所謂「美」中關係

美國務院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葛林，於二月廿日在華盛頓蘇爾格萊夫俱樂部發表一篇事先準備題為「美」中關係：邁向正常化的演說，檢討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的「成就」，同時對所謂「關係正常化」一詞，亦曾有所解釋。關於所謂「關係正常化」，葛林稱：「『關係正常化』是關於實質而非形式的一種簡單和一般普通常識的觀念。貿易、旅行、交換資

料與經驗，以增進人與人之間的瞭解，都是正常的。但所謂正常關係最重要者，乃國與國之間雖有歧見，仍能討論問題，以期獲得解決。倘若不能解決，至少也可暫時處理，直到可以解決」。關於尼克森訪匪後的「成就」，葛林首先指出：「一年前，尼克森訪問北平……，使世界外交展開了新的遠景，為和平帶來了吉兆」。繼稱：「總統結束北京訪問時，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表了一個聯合公報，雙方表示都認為兩國關係正常化」，不僅符合「中」美兩國人民的利益，而且會對緩和亞洲及世界繁榮局勢作出貢獻，為支持這一目標，我們同意了不少諸如發展人民和人民之間的交流，擴大雙邊貿易和改變政府級的交換意見等特定事項」。「公報中把手段和目的分得很清楚，總統前往北京，並不是單為貿易或者交流，或者甚至只為溝通意見的。當時所關切的是我們之間的關係不正常，幾年前仍被很多人認為難以克服的四大障礙：互不信任、思想意識、印度支那戰爭和臺灣，在尼克森訪問北京後，這些障礙不是已經掃除，便是已經降低」。

關於「臺灣問題」，葛林闡稱：「臺灣問題在高峯會議中沒有解決，並且將來不會在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雙邊談判中予以解決。這必須由在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們自己完成。我們所關心的是任何解決都是和平的。但是，高峯

會談提供的機會，使我們可以清楚地重新申述我們的立場和消除「中國」對我們的意圖可能發生任何誤解，有助於溶解這個感情化的問題。我們說明有意於一個和平解決的前景，我們的最後目的是要撤出在臺灣的軍隊和設備，而且說明我們的部隊。我們業已清楚說明我們並未進行任何決定臺灣地位的陰謀。結果是無論臺灣問題本身或著我們要和中華民國維持外交關係和防衛義務的意圖，都不形成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雙邊關係的障礙」。

關於美匪關係，葛林指出下述各方面在過去一年間會有進展，並期待更有進一步的進展：

「一、溝通的途徑業已開啓，並正用於催減少由於偶然事件、誤算、或誤解所造成的對抗危險，而且積極地致力探明具有共同利益的各方面的實質。

二、貿易、旅行及交換人員的結果，雖不顯著可觀，但令人欣慰。一九七一年開始時，雙方的貿易總額不到五百萬美元，一九七二年的貿易上升到約一億美元，一九七三年的估計是這一數字將會增加三倍。」

三、過去一年間，美國方面有醫生、大學教授、科學家、新聞記者及商人一千餘名訪問大陸匪區。這些訪問象徵了並且認明了華盛頓與北平關係的改善。」

葛林在結論時稱：「國家到底是由人來統治的，歷史上充滿了國家不顧其民族利益的例子。」

但是「中國」（匪）和美國能夠繼續在邁向正常關係上有進展，而通過種種關係，對亞洲的持久和平有所貢獻，那一地區中的緊張將為大大減削，而在該地區中所有國家之間發展一個正常關係的體系的也會顯著地改進」。

葛林這一篇演說，有些固是事實，但其推論實是跡近武斷，從此當可窺出美國今後對匪政策的真正意圖，值得吾人警惕。

五、莫柳泉談論「臺灣前途」

美國務院中國科科長莫柳泉於二月二日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舉行的有關「臺灣前途」討論會上發表演說，對於所謂臺灣前途及其將來，謂「將決定於臺灣的內部的力量，決定於中國大陸上的發展，決定於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中如何自處」。莫柳泉的演說內容，殊值重視，茲摘要如下：

「現在美國對臺灣問題所採的政策，仍然遵循我們傳統的對華態度，並反映我們對終止對抗時代所抱的新希望。而且一般都承認，此一問題主要是一政治問題，而非法律問題。美國現在的政策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上海公報』中已有最清楚的說明……」

「『上海公報』中的這一部份代表了美國的一項努力，說明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兩方面所採取的對臺灣地位的立場，這是對該項立場盡我們所了解者所作的說明。雖然美國政府聲明不反對那一立場。它也不認為有承諾支持這種觀點的必要，因為美國相信這一問題是要由臺灣海峽兩邊中國

人來解決的問題。我們所關切的，只是此一問題應和平解決。關於這一點，我們充分認為應予如此。我們繼續信守對中華民國的防衛承諾，仍是美國上述決心的明證，即此一問題的任何解決，均必須為有關雙方所接受的一切解決。

「美國政府採取趨向於與北平關係正常化的基本目標，尼克森總統一九七二年二月則會聲明：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交談將不犧牲友人……與中華民國，我們將維持我們的友誼，我們的外交關係，與我們的防衛承諾。因而，一方面『上海公報』中肯定表示臺灣問題的最後解決是操之於中國人之手，一方面我們對中華民國的條約承諾則繼續有效。」

「美國政府對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將來關係的官方立場，在尼克森總統的一九七二年外交政策報告中說得最為清楚：臺灣與大陸間的最終關係不是美國去決定的事。由有關雙方和平解決此一問題，將對遠東地區緊張情勢的緩和大有助益。不過，我們不鼓勵任何一方採取任何特殊途徑。」

「儘管中華民國自一九七一年十月退出聯合國後已遭遇若干挫折，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仍繼續在世界上維持範圍廣泛的外交、經濟與文化關係。在美國看來，中華民國已繼續以行動顯示，它在國際生活中能作重要貢獻，美國仍繼續主張在一般國際機構中，應有代表臺灣人民利益的代表參加。」

「臺灣的將來，將決定於臺灣的內部的力量，決定於中國大陸上的發展，決定於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中如何自處。」

「美國有些批評我們對臺灣問題政策的人發現，雖然美國政府能敏銳地覺察到這種情勢的許多方面，但是却不能獲致一項解決辦法，他們因而為此感到沮喪。他們指責官方的政策曖昧或前後不一致，因為這些政策不能成為一項可以簡短易說的詞句如『一個中國』或『一個中國，一個臺灣』的簡明政策，這些人基本上建議的自然是：美國政府應決定臺灣的將來所採取的明確方向，然後促使有關各方面照這一方向走。」

「我們將不這樣做，即使我們希望嘗試，也難以想像有什麼一種簡單的政策可以由美國加諸於有關各方面，從而解決今天的難題。我們為臺灣可能設想的每一前途，今天都有它不可信賴的因素。但是前途總會發展，問題總會獲得解決，難解的結也總會隨時間而解開。」

「我們不能準確地說出臺灣將有怎樣的前途，但就實際而言，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能預測任何一個國家的將來。……美國在『上海公報』及其他公開聲明中已清楚說明，

它認為那一問題將來的解決，只能由直接有關的人民予以達成。美國繼續對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所作的防衛承諾，自然有助於保證最後的解決將是一種和平解決」。

直至三日在該校主辦的關於臺灣前途的討論會，規模甚大，參加此項討論會者約二百五十人，包括中華民國、美國、日本、蘇俄、共匪與臺獨份子的正式與非正式代表。莫柳泉是代表美國政府發言。在會中替中華民國發言的有曼菲斯州立大學政治學副教授魏鏞，前燕京大學教授澳洲籍的林賽勳爵(Lord Michael Lindsay)舊金山大學與胡佛研究所教授曾任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的吳元黎。表示中立，但發言以反映美國政策為主的有密西根大學教授前駐香港副總事懷汀(Alien Whiting)、史丹福大學政治學教授羅茲(Robert North)。中立，但同情中華民國者，有抗戰期間在華任記者，現已退休之史迺爾(A. T. Steele)。明顯為臺獨份子發言的，有威斯康辛大學教授曾以傅爾布萊特交換教授名義在臺活動一九六四年被我政府拒絕入境之孟德爾(Douglas Mendell, Jr.)、耶魯大學法學院賴斯曼(M. W. Reisman 未到會，其與陳逆隆志合撰之論文係由別人代為宣讀)、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助理教授康恩(Winston Kahn)。無從判斷其政治立場的有加拿大托倫多大學教授魏德(Donald Wade)、墨西哥自治大學教授單克利(Alberto Szekely)，曾對臺灣學生活動

作實地調查之奧克蘭大學政治學教授艾頤頓(Sheldon, Appleton)等。

日本與蘇俄的與會人士的發言，幾乎百分之百的與美國的態度相同。蘇俄外交部參事巴頓夫的講題是：「臺灣：中國的一部份？」，他說：「那後面是不應該加一個問號的。臺灣的現狀不是國際法的問題，而單純是美國的政治與軍事考慮所造成。中、美、英三國一九四三年的開羅宣言，明白說臺灣是中國的領土，凡日本從中國取得的領土，戰後均應歸還。美國於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會重申此一立場。但在廿二天之後，杜魯門總統却說臺灣的地位「並未確定」，此一轉變顯然是韓戰造成的。我們誠難預測臺灣的未來，不過此一政治問題「最後無疑應由中國人自求解決」(No don't issue is of a political nature that will be solved eventually by the Chinese People Themselves.)」，丘吉在提及我政府時，均用「中華民國」，偶爾用 Chiang Kai-Shek Government 一詞，從無漫罵或污蔑字眼。

日本駐美大使館參事岡崎久彥在會上稱：「日本現已與中共建交，但日本與臺灣之間商務與文化關係則繼續循『非政府途徑』處理。東京現設有『交流協會』，並在臺北、高雄兩地設立分會，舉凡日臺間移民、商務、文化、交通運輸等事宜均由此一民間機構負責，日本政府則予以財務上之支援，臺灣方面亦有對等機構辦理相同事項」。

貳 中華民國的嚴正聲明

美匪發表宣佈互設「聯絡辦事處」的「聯合公報」後，中國民國外交部於二月二十三日凌晨發表聲明，重申我國嚴正的立場，其全文如下：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二月尼克森總統赴

匪區之前及離匪區發表所謂『上海公報』之

後，中華民國政府曾於是月十七日及廿八日先後鄭重聲明：目前盤據大陸之共匪係一叛亂集團，絕對無權代表中國人民。美國與共匪間所作之任何協議，中華民國政府一律不予以承認。

「此次美國宣佈與共匪互設所謂『聯絡辦事處』，實完全違反中國人民之意願，中華民國政府茲重申上年二月十七日及廿八日兩次聲明中所持之嚴正立場。

「中華民國政府乃全中國人民依據憲法產生之合法政府，一貫以維護自由民主及世界和平為其神聖職責，堅決奮鬥，始終不懈。

「美國與共匪間所採取之任何行動，絕不影響中華民國反共復國之決心與國策」。

我行政院蔣院長經國，於二月廿三日在立法院作施政報告時，亦曾鄭重指出：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共匪的判斷有很大的錯誤，以致造成中國大陸的淪陷。大陸淪陷後，共匪第一件事就是宣佈美國為其第一號敵人，其後又韓戰、越戰，不僅使中、韓、越三國人民受到很大的苦難，美國也付出了有史以來最大的犧牲和代價。今日共匪與美國發表的「聯合公報」，共匪在方法上雖有改變，但其本質並未改變，任何人想與共匪和平共存，都是白日作夢。因此，鄭重告美國政府，對共匪不宜，也不應該再作第二次的錯誤判斷。再次的錯誤判斷，將使整個亞洲人民關入鐵幕之中，前車可鑑，希望美國不再重蹈錯誤的覆轍。

蔣院長又稱：我們不諱言有困難，但共匪的困難比我們更多；其內部的四分五裂，使其至今連偽政權的「主席」都無法產生；共匪明知其所握的是敵人美國之手，但面對困境，已使它不得不去拉攏美國。

蔣院長強調：有人曾提出所謂「兩個中國」的論調，但我們有信心，也有決心，要世人知道：中國祇有一個，現在是中華民國，過去是中華民國，將來還是中華民國。我們堅持反共復國的大義血忱，中華民國必然永將屹立如山，來證驗我中華民族之不可輕侮，不可搖撼。

繼之，香港和臺北的報刊，對美匪互設「聯絡辦事處」亦連續發表社論，予以激烈抨擊。香港《工商日報》二月廿四日社論為「美對我國又一次不義行動——評析美、毛聯合公報的意圖與作用」、《香港時報》二月廿四日社論為：「美在遠東方面政策墮入現實主義惡道」；臺北《聯合報》二月廿三日社論為「美國一錯再錯——對美匪『聯合公報』的批判」、《新生報》二月廿三日社論為「美國勿重蹈歷史的覆轍」、《中華日報》二月廿三日社論為「美國引狼入室」、《中國時報》二月廿三日社論為「美毛關係的又一突破——評美匪『聯合公報』」、《民族晚報》二月廿三日社論為「美國政府的又一不智不義之舉」，我們不必細閱各報社論的內容，僅看其題目，即可從其字義的內涵，察知中華民國海內外報刊的嚴正態度，和堅決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反共復國的立場。(待續)

蔣院長又稱：我們不諱言有困難，但共

(上接88頁)

(正法念經有云：天人中有十六苦，第六爲愛離別苦。余早歲辭家，預抗日戰爭。繼而國變，一門星散。祖妣輩凡數十人，南北東西，音問罕通。今夕思侄於長白山，念女於美東岸，別離之苦，自少日至今。年華老大，愛而不見，誠足悲憂。楞嚴求寂，復何有哉。)

以上二詩，計爲現存者辛卯冬至詩之十及十一疊（中間亦散三首），加上今（壬子）年所作，共十三首，但估計尚有二三首找不出稿。二三十年來，流離國門外，憑此，亦頗可懷思往事。唐信《哀江南賦》云：「提挈老幼，闢河累年，生死契闊，不可閭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燄然。」日窮於紀。歲將復始，逼迫危慮，端憂暮齒；……今日也正是這樣的時候，回顧一下——祇是回顧一下而已。

民國六十二年元月四日，於香港。

此文前面提及在江西省的永新縣作的詩，找出一首，錄如下；原題目祇是「永新途中」，永新詩見存三首，此爲其一：

冬盡身猶旅，殊方意轉煩。形雲梅店樹，寒水繹郎村。卵石時碍足，行人嘆望門。將昏投竹宅，白雪滿荒原。